

中国周边安全的新认知： 特点、功能与趋势*

冯绍雷 封 帅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的不断成长，周边安全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时代命题。作为一个中国化的概念，“周边”的含义已经超越了地理边界，成为一个由地理意义、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交织而成的综合性的研究范畴。通过比较世界主要大国对于周边的理解，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特点进行综合分析，可以为中国认识和处理周边问题提供借鉴。总的说来，中国的周边问题具有复杂性、功能性、整体性和全球性的特点，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尽管目前在中国周边地区出现了很多突发的热点事件和冲突，但从历史的全面的视角来看，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在经济合作、交通运输、非传统安全合作以及人文教育合作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存在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只要坚持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在新的全球化形态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必将共同构建长期稳定的周边合作新局面。

【关键词】周边安全；中国周边；周边认知与特点；周边功能；周边安全趋势

【作者简介】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封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上海 邮编：200062）。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3）02-0034-24。

* 本文为教育部“学习宣讲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理论研究课题”项目的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2JFXG013。感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和杂志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出现的错漏由作者承担。

在所有大国的成长过程中,周边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起着重要作用,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三十多年来,在全球化和地区化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周边问题,尤其是周边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过程中既具有长远意义,又具有现实紧迫性的时代命题。它不仅吸引了中国决策层的充分关注,而且也得到了中国社会的空前聚焦。同时,近年来中国周边问题在发展过程中展示了众多的特点和趋势,这些新的变化必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未来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只有通过理论和现实层面的深入研究,制定和实施恰当的周边战略,才能够把握中国发展的历史机遇,实现中国与周边的深入持久合作与全面和谐发展。

一 中国周边研究的范畴问题

自冷战结束以来,对于周边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学术界相当程度的兴趣和投入。“周边”这一范畴实际上已经成为中文语境中约定俗成的重要政治和学术术语。然而,尽管“周边”的说法已经获得了普遍接受,但“周边”作为一个范畴或者概念的内涵和特点却还没有获得完整而充分的表述。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最为重要的无疑是这一概念自身的复杂性。我们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多学科对于周边问题的全面描述、对比和分析来解读“周边”,才可能对这一领域的知识进行较为综合而系统的理解。

“周边”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或范畴,涉及多个学科的研究。它既包含地理的因素,又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意指。目前学术界所讲的“周边”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邻国”或者“邻海”的范围,也远远超越以传统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地理界限。“周边”是在给定国家政治经济实力的前提之下,相对于一个国家的战略纵深地带而言,与国家战略利益高度相关、国家力量可以控制和辐射的边境地区,与外部国家或力量直接相邻或关联的环陆海空间以及此空间中多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环境等要素的相互联系与组合。因此,“周边”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其视野不仅仅局限于某个或某几个地区与国家,而是指涉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所有上述相关区域的复杂多变的集合。作为一个研究范畴而言,中国的“周边”研究至少包括以下四个层次的内容。

层次之一:地理的周边。即有着明确地理学规定性的周边范畴,比如,与邻国之间的陆地山川相连的部分、海洋地区的大陆架延伸等。这一层次的周边主要指的是中国的环陆海空地区,既包括中国的陆上、海上、邻国或其局部地区,也

包括与邻国接壤的本国边境地区。

层次之二：政治的周边。主要是从宪政和国际条约所确认的主权与边界的角度出发而界说的层次。这里主要指的是，就民族主权国家而言、或者就帝国而言的边远地区，它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政治主权与疆域之外的外部邻国与地区，二是在本国边界之内的边疆地区。传统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的国别和地区研究主要从这一角度来理解。

层次之三：经济的周边。即与中国国家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海上、陆上、空中的航运通道、能源通道、贸易通道，包括军事通道。通道所涉及的范围往往已经超越了地理上的周边，它与国家的发展和成长密切相关，属于国家利益区域的延伸。在尊重国际规章与他国主权、领土安全和关照他国舒适度的情况下，提升对于通道畅通的关切，并加强对该领域的研究，这是中国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自然发生过程。

层次之四：文化的周边。是指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那些具有主导性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在其主体政治单位之内的文化传播所及的边远部分；或者虽处于政治边疆之外，但依然存在有该主体文化不同程度影响的相邻地区。就中国而言，中华文化圈、邻近的中国移民聚居区等方面的议题都属于这一层次。这些现象发生的空间在地理上或近或远，但不管怎样仍然属于中国非物质影响力的延展，这是文化意义上的“周边”。随着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大，文化周边将越来越多地成为研究者所关注的议题。

地理周边是周边研究中所指向的自然物质基础。政治周边不言而喻是直接由法律和政治所规定的行动和利益的范围与尺度之所在。经济周边往往是在相互交往之中而形成，具有巨大的可塑性，但大大拓展了和外部世界之间物质交换的空间。文化周边则使得周边所包含的内容超越了物质空间、自然疆域或者邻近国家与地区的范围，使其充满了人文气息和精神性世界交往的意义，因而使周边问题的内涵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以上各项共同构成了“周边”的内容。正因为如此，“周边”概念所代表的意义始终是多元的，它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既有固定的内涵，又是动态的、历史的、变化的范畴。在地理条件的客观基础上，“周边”的范围会随着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实力与地位、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尤其是对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这种运动和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极为深刻。

在近几十年的过程中，“周边”概念的成型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历程，在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发展过程中，中国对于“周边”这一范畴的理解和阐述也在随着时间

的延续而不断变化和完善。

中国历来重视与相邻国家、地区的交往，维护相邻区域的和平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临近国家与地区一直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周边”一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出现在中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研究的文献之中，这种变化归因于领导层开始重视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外部条件以及应对冷战后错综复杂的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周边”以及与之相关的“周边环境”、“周边安全环境”等概念的提出反映出中国外交理念的发展，“周边”作为一个分析层次和对外政策领域已经被提升到了重要地位。^①

20世纪90年代之后，“周边”概念的相关表述已经进入了党政文献之中，此后官方文献中普遍使用“周边环境”一词来描述中国对亚洲形势的判断。这一时期国内学术界的“周边”研究较多关注于中国面临的战略形势。例如，郝润昌先生将周边安全环境上升为同全球安全环境和地区安全环境同等重要、共同构成中国安全环境的组成部分。^②学术界在使用“周边环境”概念的时候，往往强调发展同毗邻国家的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区域合作组织。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于“周边”概念的认识和研究有了新的发展：第一，认识到大国因素对于中国周边环境的影响作用，要求协调同大国的关系，避免与大国的冲突。第二，明确将周边环境相关的工作置于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地位，强调中国在周边地区应当有所作为，有必要通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巩固和增强地区影响力。第三，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周边环境在不同地区表现出差异性，应当根据利益关联性有针对性地制定对待周边国家的政策。第四，随着中国的海洋意识和对海上疆域的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从海权的视角进入“周边”概念使得中国对外关系在视野、深度和复杂性等方面有所突破。

对于中国的周边发展战略，戴秉国同志在2010年的《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一文中做出了明确的阐述。他指出：“我们自己不谋求霸权，也不会同其他国家在我们这个地区争夺霸权，搞什么共同霸权，或搞什么‘门罗主义’。我们奉行的是‘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亚太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自身发展营造稳定、良好的周边环境，与有关各国实现互利共赢，愿意永做东盟和亚洲各国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③

由此可见，如今中国所说的“周边”绝不等同于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古代东亚“朝

① 钟飞腾：《“周边”概念与中国的对外战略》，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117-130页。

② 郝润昌、高恒：《世界政治新格局与国家安全》，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 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载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zyxw/>

贡体系”。“朝贡体系”是古代东亚地区的国际体系，其最明显特征是以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双边“封贡关系”为结构，“封贡关系”体现出古代中国文化和经济的优越性以及对外围的吸引力。“朝贡体系”的本质是一种等级制封闭体系结构，由位居体系顶层的中原王朝以册封的形式来为体系中的其他参与者提供政治合法性，并通过朝贡形式为体系提供物质利益、安全保障，分享共同的文化认同。^①与封建帝王时期中国外部关系具有实质性区别的是，当代中国与周边的关系以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是建立在平等关系基础上的互利关系，中国无意也不可能重返古代帝国的行为逻辑，更谈不上重建新的“朝贡体系”。

同样，中国所说的“周边”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中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也大不一样。以“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为核心的世界体系理论从结构主义的思路出发，基于社会经济长周期发展的趋势，从政治、经济和文明三个层面重新诠释世界历史的发展。^②但世界体系论中所隐含的意义是抵抗性的，强调的是中心国家对于半边缘和边缘国家的剥削关系以及边缘国家对于中心的挑战，是一种消极的双向互动所形成的结果。但中国对于周边空间的开拓努力强调的是平等、合作与共赢，通过协商和相应的制度安排获得合理的影响力空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周边”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概念，尽管“周边”一词在古代语境中难以避免地蕴涵有相对于华夏帝国中央而言的边远地区的含义，但在现代中文语境中，“周边”一词的含义蕴涵了复杂而深刻的内容。它既包含了地理空间的要求，又体现了政治、经济，甚至文化的意义。任何西文词汇，无论是英文的“periphery”、“marginal”、“neighboring”，抑或是俄文的“окружающий”都无法完美地表达其经过历史转换与超越的那种中国化的含义。

就近三十年来的实践而言，“周边”概念的提出是中国外交理念不断变化的体现，是对中国早年所秉持的“三个世界”的国际架构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周边”概念适用范围从亚太毗邻国家扩展至冷战结束后的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其内涵也由单纯的陆权扩展到海洋权益、非传统安全等诸多领域。中国学界的“周边”

① 关于朝贡体系的研究，参见黄枝连：《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美]柯岚安：《中国视野下的世界秩序：天下、帝国和世界》，徐进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49-56页。

②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页。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论述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罗荣渠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观点和对其的理论思考已不局限于依赖以西方国家为蓝本的国际政治学科研究，而是立足丰富的理论历史内涵和当下复杂现实的综合反映，对于“周边”的思考也将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

二 各国周边认知的比较

尽管“周边”概念本身具有很明显的中国色彩，对于“周边”这一词语的使用在各个国家也有着颇为不同的理解，但相近似的“周边问题”却毫无疑问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体量规模巨大的国家所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任何国家都必然存在着对于本国“周边”的重要关切。基于各自的环境和历史，不同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对于与周边研究相关的一些学科范畴都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通过对世界上各主要大国对于“周边”的认知比较，可以让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周边问题”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一）美国对周边的认知^①

与中国、俄罗斯等邻国众多的大陆性大国不同，由于美国独特的地缘位置和发展历史，导致其政治精英对于美国的“周边”概念有其特有的认识，并且这样的认识随着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实力与地位、自我认知和自我想象的变化而变化。在建国之后的领土扩张阶段，政治精英希望摆脱欧洲的影响，建立自己至少先是在北美、以后在整个美洲的稳定地位。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以及之后的“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就是随着自身实力的上升，美国对自己疆界之外的“后院”（美洲）的利益宣言，反对欧洲传统霸权插手美洲事务，从而确立自己对于美洲事务单方面干预的权利。^②

在国土疆界确定，尤其是美国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超级大国之后，其政治精英和决策者们更是从构建国家的全球利益角度来看待美国周边利益。他们的视野很快超越了临近区域的局限，不仅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理空间，甚至超过了科学意义上的地球空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高边疆”战略中，宇宙空间也成为美国周边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当下的美国政治精英否认美国是现实中的帝国，或在治理全球过程中正实施帝国建构，但正如一些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论述的那样，美国在形式上试图推广以自

^① 该部分内容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师资博士后张昕提供初稿，在此致谢。

^② George Herring, *From Colony to Superpower: U.S.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77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由市场、民主、法治为基础的普世价值观和制度体系，构建一个建立在美国价值基础上、以美国制度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但又经常不愿意承担作为帝国，尤其是作为制度推动者所需要承担的人力和资源成本。^①

在20世纪后期，尤其是80年代末开始的新一轮自由主义浪潮中，冷战终结给传统意识形态对抗基础上的、以国家和国家联盟为基础的周边观念带来多重挑战，特别是在诸如社会学、人类学、社会思想、批判理论、文化研究等领域逐渐产生了不同于政治学、国际关系等领域中对于“周边”的认识。这些学科往往不从民族国家出发，转而挑战传统民族国家对于特定地域内对人口和资源的绝对控制权（包括实然和应然两层意义）。“流动的边界”（fluid border），“边界之间”（between borders）和“跨边界”（crossing the boundary）等都成为最近二三十年几个学科中的热门核心概念。^②

（二）俄罗斯对周边的认知

俄罗斯对于与“周边”相关联的概念的理解往往植根于其帝国历史的背景以及其冷战终结之后跌宕起伏政治疆域状况的变化，这些观念主要体现在对“周边”范围的界定及其处理周边事务的政策与措施中。俄罗斯所强调的类似于“周边”的范畴，主要指原属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 and 地区以及其他相关领域，也是俄罗斯强调自己“影响范围”（influence area）的核心区域，2008年的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交战过程中，俄罗斯领导人梅德韦杰夫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认识。^③在这一范围内，俄罗斯努力以欧亚联盟、海关同盟、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形式强化自己的主导性地位。鉴于苏联遗留下来的在周边邻国的“国中之国”的特殊现象——如在格鲁吉亚境内的南奥塞梯、阿布哈兹等“未被承认的国家”（unrecognized states）——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俄罗斯甚至不惜接受挑战，以武力的方式来宣示其捍卫这一政治疆域的决心。

① Niall Ferguson, *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 London: Allen Lane/Penguin Press, 2004.

② Henry Giroux, *Border Crossings: Cultural Workers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其他的研究还包括：安德鲁·赫里尔（Andrew Hurrell）对设想中逐渐兴起的，以多个地区性体系并存的国际社会和二战后围绕在美国周围的国际社会之间进行的比较。参见Andrew Hurrell, *On Global Order: Power, Value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玛格丽特·凯克（Margaret E. Keck）和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的研究也显示特定政策领域内，部分跨国、非国家政治组织已经形成超越国家边界的政治行动网络。参见Margaret E. Keck and Kathryn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③ 参见俄罗斯总统网站（www.kremlin.ru）所发表的关于2008年瓦尔代会议的发言记录。

在原苏联空间之外，中国、美国、日本、伊朗、阿富汗，包括北极地区等原苏联的临近地区则构成了第二个层次的重要关系。在这一领域里，无论是出于帝国的传统积累，还是现代激烈的国际竞争所造就对于空间问题惯有的警觉，俄罗斯迄今对其“周边”领域诸如中亚以及包括在其境内的远东、西伯利亚的空间安全历来投以非常的关注。这是中国在与北方邻国交往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除了传统安全因素之外，国际政治的诸种非传统安全因素也使得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周边地区事态变化与其整个国家安全体系关系保持着敏感。俄罗斯政治精英除了强调以实力维护地理空间的安全，也非常擅于以“欧亚主义”、“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等这样一类理论构建来描述其有别于“他者”的政治认同；俄罗斯还会强调愿意充当“东西方交流的桥梁”这样的理念，来表达其思想与文化关切与认同远远超越了一般物质空间的意义阙阅，这也是俄罗斯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在此背景下，作为前超级大国继承国的俄罗斯非常擅于以联盟、合作机制、多边秩序构建，包括战争等方式处理周边事务。在俄罗斯的外交行动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其在不同层次上追求自己的“影响范围”的特点。

（三）日本对周边的认知^①

对于“周边”这一概念，与中国具有深远历史文化关系的日本学界主要是从历史形成的地缘政治学视角来加以认识的。这种认知与日本的国家安全利益直接关联。近代以来，日本著名启蒙学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就已经明确地将中国、朝鲜等地区看做日本利益密不可分的“周边”地带，^②而日本的明治政权元老山县有朋则首先提出的“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对日本“大陆国家”战略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方向性意义，成为近代日本扩张性大陆政策意向的标志。^③

二战结束之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飞速发展，对于周边的重视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又重新活跃起来。1980 年，大平正芳首相推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认为强大起来的日本应负起责任，在日本的大周边——亚太地区——掌握主动权，从政治上担负起该地区稳定的使命，对付日益增加的北方威胁。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日本在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及《周边事态法》中提出“周边事态”概念。

① 该部分内容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阎德学提供初稿，在此致谢。

②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8 年版。

③ 1890 年，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提出：“国家独立自主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而且，“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能够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参见[日]山县有朋：《外交政略论》，载林茂等编集：《日本内阁史录》（1），东京：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 1981 年，第 149 页。

日本政府反复强调这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根据当时事态性质决定的、对日本和平与安全有重要影响的事态，不针对特定国家等。但2005年日美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参加的安全磋商会议（即“2+2”会晤），将台湾海峡问题纳入《周边事态法》管辖范围内。

当前，日本研究机构和学界对于周边的安全特性较为多见的有着如下认识：一是日本处于被大陆国家俄罗斯、中国及朝鲜半岛包围的态势；二是日本拥有包含周边岛屿在内的广阔海域和众多重要的国际海峡，日本外海的岛屿与韩国、中国、俄罗斯等国为连接点，孤立本土之外，安全极为脆弱；三是日本缺乏战略防御纵深；四是日本存在容易招致争端的领土资源问题；五是日本的经济活动完全依赖于海上生命线，即从霍尔木兹海峡经过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一直抵达日本的物资供给通道；六是日本处于临近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等争端危险地区。

显然，以上有关于“周边”问题的观念深深影响着日本国家的外部政治行为。

（四）澳大利亚对周边的认知

澳大利亚学界对于“周边”的认识中有着较为独特的表述。澳大利亚前国防部长乔治·皮尔斯（George Pearce）提出“远东就是我们的远北”，^①这一论点被后来的澳大利亚政治家和学者所接受。可见，远东一直被澳大利亚认为是自己的周边。2009年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除了其本土和邻近海域外，该文件提出在“从北部亚洲到东印度洋之间的亚太更广阔区域”亦有着“持久的战略利益”。^②但在澳大利亚的认知中，东亚并不是一个适当的称呼，从澳大利亚的视角来看，这一地区的适当名称应当是“西太平洋”，活跃在这一地区的中、日、韩以及东盟各国构成了澳大利亚“西部周边”，而位于东太平洋的美国则是属于其“东部周边”的范围，而澳大利亚正好处于东西太平洋的平衡点上，可以利用这种特殊的周边空间优势发挥独特的作用。

（五）欧盟对周边的认知

作为一个新型的现代国家共同体，欧盟并没有传统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周边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欧盟对于周边缺乏关注。对于欧盟的核心地区来说，东欧和地中海地区都属于欧盟的“周边”问题。事实上，在欧盟发展的过程中，核心大国对周边的认知对于确定欧盟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德国主导的欧盟东扩，实际上是将德国眼中的东部“周边”地区纳入欧洲联盟的版图。而法国则愈益将

^①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CPD)*, 1922 session, Vol.XIV, pp. 821-823, July 27, 1922.

^② Depart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March 2, 2009.

自己的“周边”指向南方,更加强调欧盟在地中海地区的作用,推动“地中海经济圈”的发展,并且在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军事行动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在 2011-2012 年的西亚北非变局中,法国和欧盟的政策选择便是这种态度最好的注解。由此可见,即使是欧盟这样的新型国家共同体,“周边”也是其非常重视的区域和外部发展的方向。

(六) 各国周边认知差异比较与中国的周边问题

显而易见,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对于周边问题存在着明显的认知差异,这种差异是它们各自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定位、不同的地缘局面和千差万别的利益诉求的综合反映。以比较的方式分析和总结这种差异,可以为我们研究中国周边问题提供参照和借鉴。

首先,周边环境决定周边认知,周边认知制约周边政策。对于美国这样处于“世界岛”、周边环境较多自然屏障的国家来说,周边的界限相对明确,安全威胁相对较小。但其他周边环境复杂的国家,自然都须更为慎重地处理周边问题。中国的周边环境既严峻又多样,这就要求中国在制定周边战略和政策时要更加注意政策的完备和周到,以便灵活应对不同方向可能出现的突发变局。

其次,不同的历史经验带给各国不同的历史记忆,直接影响着各国对于周边的理解和认知。沙皇俄国和苏联时期形成的广袤空间,是其历史遗留的重要遗产,对于空间的关注不光是俄罗斯人深刻的历史记忆,也是它当下的现实政治诉求。对于中国来说,悠久的历史 and 丰厚的历史经验乃是实现周边治理的天然条件。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凡周边治理成功的,往往与其政治领导阶层的开明包容和远见卓识紧密相连,这无疑应当成为中国处理当代周边问题的基本思路。

最后,从文明历史、国家宪政以及与领土疆域之间相互关系来看,中国既不是像美国那样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联邦体制等现代宪政结构几乎与其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同时形成的那样一种状况,也并非像日本这样处于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单一民族国家。中国与俄罗斯也不一样,中国近代历史上没有过像俄国那种急剧而大规模的扩张过程。中国是具有持续而悠久历史的多民族文明古国,又是全球化时代造就的后起新兴国家,中国不以扩张为自己周边政策的目标和动力,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保持着非常紧密的文化与经济联系。这样一种情况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照搬其他任何国家的周边治理模式,只有从中国周边自身的特点与功能出发,才能够避免胶柱鼓瑟,创造性地构建周边合作的新空间和新模式,保证中国战略利益的充分实现。

三 中国周边问题的特点与功能

总体来说，中国周边问题的历史与现状、特点及其发展态势，决定着中国在未来内外发展过程中的周边战略及其实施。中国周边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周边态势的复杂性

中国是世界上周边环境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中国拥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陆地疆土，陆地边境线超过 2.2 万公里，与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和越南等 14 个国家接壤。同时，中国还拥有 1.8 万公里的海岸线，岛屿岸线长达 1.4 万公里，沿海分布着 7 300 多个岛屿。与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马来西亚等六个国家隔海相望。中国管辖的海域总面积中有若干部分与别国的领土声索主张重叠。中国共需要与八个海上邻国划界，而当前仅完成了与越南在北部湾的划界。东海和南海地区的岛礁主权和海域划界争端随时影响着中国的海洋安全。还有如新加坡、泰国、柬埔寨和澳大利亚等相当数量的国家与中国虽不直接接壤，却始终在周边地区问题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此外，尽管美国从地理位置上与中国相距较远，但因为其在东亚、中亚和中东等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全面存在以及全球性的影响，所以，美国势必要在中国的周边问题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周边地区所牵涉到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等各大区域的至少二十多个国家。周边国家情况复杂多样，在领土、人口、民族、宗教、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差异巨大。大国云集，互动频繁且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复杂的周边形势迫使我们必须要有深刻的洞见和全面的能力去应对周边突发事件，增强处理复杂周边环境的水平。

（二）周边功能中的多样性

周边地区对于中国而言，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领域都具有重要价值。可以说，周边地区就是中国对外战略乃至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石之一。

从国家安全上讲，周边地区是防御外敌入侵的战略屏障。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与中国边疆地区的局势息息相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直接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安全战略的实施。保持稳定的周边态势，不仅可以为国家发展提供良好的地区环境，对于维护国家安全、捍卫主权与领土完整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经济利益上讲，中国与周边地区合作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1

年,在中国排名前 11 名的贸易伙伴中,有八个国家和地区位于中国周边地区。周边国家是中国资源进口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保障中国资源来源多元化的重要源头和输送管道。因此,保持周边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对于中国对外贸易和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从对外战略上看,周边地区是中国对外战略重要支点。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周边地区是中国成为多极格局中一支重要力量的主要支点和战略依托。周边地区不仅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力量中心交往的主要平台,也是中国在国际活动中施加影响并且承担义务的主要舞台,在中国外交活动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可以说,没有周边地区的稳定就没有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没有周边地区的协同合作也就没有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空间。周边地区是中国国际战略的根本之地,也是中国发展的立足之本。

(三) 认知与决策的整体性

所谓整体性,指的是中国周边问题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无论中国周边任何一个方向的多边、双边关系,都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共同要素:(1) 主权与边疆问题;(2) 内部发展与对外关系的相关性问题;(3) 中国文化延伸与周边文化互动问题;(4) 中国与周边区域的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问题;(5) 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中的体制构建问题;(6) 中国周边关系与整个区域乃至与全球问题的互动关系。

这些问题构成了中国周边问题的主要内容,这种共性的存在也决定了中国周边问题必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性问题。

比如,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中国周边地区进入了一个问题多发时期。然而,漫长的疆域和周边多样的态势既给中国带来了复杂的周边局面,同时也给中国留下了较大的战略回旋余地。中国周边各个地区实际上并非孤立存在。最近一个时期,当东部地区出现岛屿和海洋领土划界争端和矛盾时,西部边界地区形势却有所缓转。特别是当 2012 年秋天中日之间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争端激化之时,中国与印度之间却达成了若干重要的经济合作计划。^①印度精英表现出较为理性的合作态度,同时,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也应邀访问印度。这些变化表明,中国周边问题的多样性中蕴涵着通过合作而摆脱危机的某种启示。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大国本身所具有的巨大能量,特别是中国发展进程中蕴涵的深刻合理性所决定的。

^① 参见周晶璐:《中印敲定 48 亿美元投资合作》,载《东方早报》,2012 年 11 月 27 日 A12 版。

由于中国所面对的各种周边问题相互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相似或者内在地相互关联的构成要素，因此，不同的周边问题之间往往是相互关照、相互呼应的。割裂其中的联系，只能陷入复杂的困境而不知所措。当我们从整体上思考周边问题时，就可以对周边复杂态势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周边地区当今的丰富实践与历史积累能够为中国对外战略提供更广阔的运筹空间，并提供更多思想理念和可供借鉴的实践方案。

(四) 周边治理中所蕴涵的全球性

在当代意义上说，特别是鉴于中国已经成为深刻影响全球未来发展的主要大国，因此，我们所进行的周边研究已经远远超越了地区研究的界限，而展现了全球性的意义。稳定周边，不是、也不可能封闭周边，而是为了进一步走向面向全球的改革与开放。在当前全球危机背景之下，一些大国倾向于保守主义立场对待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因此，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前景，必然深刻影响区域与全球走向。中国的周边问题始终与全球化问题交织在一起，这为中国周边问题的研究赋予了更为宏大的意义。

换言之，正当国际舆论出现对于全球化趋势的动摇，中国无论从本国的实际国情还是从世界发展的长远大势而言，都有必要对于全球化加以推进的前提下，周边合作无疑就是重新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起点。从这个视角来观察 2012 年 11 月东亚峰会的成果，来展望未来可能推进的东盟加中日韩（“10+3”），乃至于酝酿中的东盟加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10+6”）进程，都是从周边走向全局的一个新的起点。

区域既是全球化的终端，又是全球化的新起点。大国周边研究已经成为介于全球、地区和国别等研究层次之间的重要连接点。立足周边研究，探索新的全球化道路，落脚于全球治理的改进，关注全球体系改变，这应当成为未来中国对外战略的理性选择。

中国处理周边问题的立场与态度也必将深刻作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只有当中国周边地区出现和谐、稳定、进步和繁荣的局面，中国自身发展从小康走向富强才是可以预期的，中国从一个区域性大国走向全球性大国才是可以逐步实现的。

四 中国周边的态势变化

中国的迅速成长已经改变了周边态势，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区域格局。从现实情况看，尽管当下在中国周边地区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边界争端现象和突发事件，

但从总体上看,积极、稳定、合作仍然构成了中国周边局势的主题词。冷战结束之后,中国与俄罗斯、中亚等国家签订了一系列诸如边界协定等双边和多边协议,不仅解决了相互之间的领土问题,更为建立新型的国家间关系树立了典范。在当时困难条件下,这一系列成果的取得,可以为今后周边冲突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和借鉴。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中国所倡导和积极营造的周边国际环境的做法,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

(一) 一个积极合作互利的新型区域

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带动了周边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和周边地区共同构成了世界经济空间中合作互利的积极区域。

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的特殊地位和中国自身庞大的市场需求,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对周边国家经济产生巨大的带动效应。在世界经济格局和生产网络中,中国处于组装生产和向终端市场出口的环节上,凭借较为廉价的熟练劳动力和强大的生产能力完成产品的最终组装,并且直接向主要消费市场提供成品。因此,周边地区国家,无论是在产业链上处于较高位置的日本、韩国或是台湾地区,还是处于较低位置的东南亚国家,都会向中国市场提供由其生产完成的中级产品,由中国完成生产,最终出口欧美市场。同时,中国在完成产品生产的过程中,需要从周边地区,尤其是俄罗斯、中亚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进口大量能源、矿产和其他原材料,又会直接拉动资源出口国的经济。这种基于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上的联系,使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周边国家的经济成长,产业链的构建也使得中国和周边国家在吸引国际投资中形成了稳定的正相关关系。^①

据美联社的统计,截止到2011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124个国家最大的贸

^① 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参见海闻:《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载《中国对外贸易》,2004年第11期,第84-85页;[新加坡]黄朝翰:《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济新秩序正在浮现》,载《亚太经济》,2012年第5期,第3-6页;[英]大卫·兰恩:《世界体系中的后苏联国家:欧盟新成员国、独联体成员国和中国之比较》,载《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5期,第51-73页;陆建人:《中国经济会威胁亚洲吗?》,载《世界知识》,2001年第20期,第28-29页;田春生:《中俄经贸合作关系新析——经济利益的视角》,载《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1期,第31-40页;曲文轶:《中俄贸易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载《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1期,第41-57页;王小敏:《因国而异——再谈中国经济崛起对亚洲的影响》,载《世界知识》,2006年第17期,第48-49页;刘宏青:《中国对主要东亚经济体的贸易依存考察》,载《亚太经济》,2012年第5期,第54-59页。

易伙伴，几乎所有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都是中国。中国还通过广泛的对外投资、贷款和援助等形式推动整个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相互促进，合作互利，通过以自己为核心的国际生产网络，极大地促进了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经成为整个地区经济最强劲的发动机，带动着周边经济的整体成长。

（二）紧密联系并有望实现共同发展的新周边

在深入而密切的经济联系的基础上，中国也通过加强交通网络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进一步密切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和交往，并且通过能源管道建设等方式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

近年来，中国非常重视连接周边地区的交通网络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俄罗斯和东北亚、东南亚与中亚地区。从2006年以来，中国积极参加泛亚铁路的建设，分别对四个方向的泛亚铁路进行了规划。在东北通向朝鲜半岛、西北通过吉尔吉斯斯坦通向中东波斯湾地区，北部通过中蒙铁路口岸建设与蒙古铁路连通，南部与东盟各国铁路实现连通。2011年，泛亚铁路南线率先投入建设，河内至昆明铁路开工，为这场周边交通网络建设拉开了序幕。中国与中亚国家的铁路建设也正在积极磋商谈判过程中。^①

除了铁路运输之外，中国还积极与周边国家开展公路和水路运输合作。目前，使中国与中亚国家形成广泛联系的“新丝绸之路”公路运输通道已经基本完成，经过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和巴克图的三大公路口岸与哈萨克斯坦连通，再转进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中国积极修建连通中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的高等级国际通道，为货物运输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条件。^②

能源管道建设是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未来发展的另一项战略举措，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和周边国家未来的经济前景。过去十年来，中国已经在东北、西北和西南三个方向全面推动能源管道的建设，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新局面已逐渐成型。在西北方向，中国与中亚的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中哈原油管道第一期工程已于2006年通油，穿越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一直到达中国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线A、B两线已经分别于2009年和2010年投入使用，而C线已于2011年底开工建设。上述油气管道的输气规模已经占到中国天然气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对于中亚三国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① 李卫民：《连通东盟和欧亚大陆的泛亚铁路》，载《中国铁路》，2007年第7期，第51-54页。

② 毕燕茹、秦放鸣：《中国与中亚国家交通运输合作探析》，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103-106页。

在东北方向,尽管在谈判过程中几经波折,但中俄原油管道最终还是顺利完成建设,并于2011年1月1日正式启用。这条管道起自俄罗斯的斯科沃罗季诺,止于中国的黑龙江大庆,全长近1000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500万吨,最大年输油量3000万吨。这条管道的贯通无疑将成为中俄经贸发展的新纽带。此外,在西南方向,中国与缅甸两国于2009年签署相关协议,中缅油气管道在2010年正式开工建设,预计将于2013年竣工。按照设计,该管道的建设将为中国提供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但更为重要的是,管道的贯通,将极大地拉动缅甸石化工业的发展,推动缅甸的城市化建设,改善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带动缅甸经济的发展,与邻国经贸合作也将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中缅能源管道的建设,将成为缅甸乃至其他东南亚国家难得的发展良机。^①

由管道建设和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的宏大项目所奠基、包括连带着相关跨体制的出现,表明一个崭新的中国周边态势已经初现雏形,这既显示中国周边空间所蕴涵着的巨大能量:中国的周边区域并不是一个凝固空间,而是一个可以由发展来加以营造、由合作来加以推动成长的巨大基地,甚至于正是在这一片历来被认为是难以管治的土地上,正在出现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共建跨国法律制度的尝试。

(三) 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新空间

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关系领域中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凸显,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往往具有普遍性和跨国性,因此,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就成为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键。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的合作不断加强,在环境问题、水资源利用、反恐、禁毒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合作有所进展,中国与周边地区已经初步构成了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新空间。^②

^① 参见天大研究院资源与环境课题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能源冲突及安全隐患”专题报告,2011年12月31日, http://www.tiadaistitute.org/cn/artic/e/1158_1.htm; 蒲明、马建国:《2010年我国油气管道新进展》,载《国际石油经济》,2011年第3期,第26-34页;蒲明:《2009年我国油气管道新进展》,载《国际石油经济》,2010年第3期,第14-20页;王海燕:《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能源合作:趋势与问题》,载《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3期,第94-103页;[俄]C·日兹宁:《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对外能源合作》,载《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3期,第71-79页。

^② 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参见余潇枫、李佳:《非传统安全:中国的认知与应对(1978-2008)》,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89-96页;冯绍雷:《十年后的展望——关于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定位与空间的思考》,载《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2期,第3-7页;刘卿:《论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载《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1期,第57-62页;孙壮志:《上海合作组织反恐安全合作:进程与前景》,载《当代世界》,2008年第11期,第19-21页;杨恕、王婷婷:《中亚水资源争议及其对国家关系的影响》,载《兰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52-59页;邢广程:《中亚的利益取向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载《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6期,第3-6页。

恐怖主义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也是中国和周边国家需要共同面对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中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的平台，与周边国家在联合打击地区恐怖主义方面开展了积极广泛的国际合作。从上合组织成立伊始，反恐和安全合作就已经成为该组织的首要目标，各成员国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2004年6月，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在塔什干正式设立，极大地推动了各成员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除了建立一系列合作机制外，上合组织还通过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等方式建立和增强各国军方在反恐军事行动中的合作与互信。从2002年开始，各成员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举行了一系列反恐军事演习，尤其是“和平使命”系列军演成为了成员国元首首次在现场观摩的联合反恐军演，对于各国的联合反恐行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除此之外，中国还与巴基斯坦就反恐问题开展了积极广泛的合作，从2004年起，双方通过联合军事演习，提高了在跨境反恐中的统一指挥与协同作战能力。可以说，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基础，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的反恐合作有效地遏制了恐怖主义在中国周边地区的蔓延，为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共同安全利益提供了切实的保障。

在环境保护方面，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就已经开始与周边国家的合作，1992年，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和蒙古五国成立了东北亚环境合作会议。这是区域内启动较早的政策性对话机制，是五国环保部门就各国环境政策进行交流的论坛。1995年，中国、日本、俄罗斯和韩国四国启动“西北太平洋区域行动计划”。1999年，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启动环境部长会议（TEMM），成为迄今为止东北亚地区发展最成熟和最完备的区域环保合作制度。2000年以来，在中、日、韩三国主导下，地区环境合作向着跨区域的方向发展。2002年11月，在老挝举行了首届“东盟和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环保合作扩展到整个中国周边地区。2010年以来，以第三次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通过的《2020年中日韩合作展望》为标志，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三国多边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中国与东南亚和中亚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多跨界河流，水资源开发和利用对于中国周边国家的社会生活产生着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南亚方面，中国从1996年起便与湄公河委员会建立了正式对话伙伴关系，自从2002年4月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与湄公河委员会关于中国水利部向湄委会秘书处提供澜沧江-湄公河汛期水文资料的协议》之后，中国方面每年都向湄公河委员会秘书处提供澜沧江汛期水文资料，以协助下游国家预防洪灾。双方在信息透明、水资源合作开发以

及湄公河航运领域已经建立了非常广泛和全面的机制性合作, 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共享澜沧江-湄公河水资源提供了保障。在东南亚地区, 中国与缅甸、老挝和泰国积极推动湄公河航运合作。在 2011 年湄公河惨案之后, 中国、缅甸、老挝和泰国建立了联合执法机制, 保证了湄公河航运的安全, 也为周边各国联系中国市场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这是从跨国法制入手, 构建周边秩序的一个重要而取得重大进步的实例。

中亚国家地处欧亚腹地, 水资源严重缺乏, 加之中亚河流多属于跨境河流, 因此围绕水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争端已成为该地区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隐患。在中亚水资源的问题上, 上海合作组织为中亚国家水资源合作提供了有效的平台。从 2004 年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开始, 合理利用水资源问题就已经成为各成员国之间在组织框架内开展合作的重要工作议程。借助这一平台,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等国成功地解决了额尔齐斯河和伊犁河的水资源分配和利用问题, 并且在共同建设水利设施等方面开展了积极的合作。这一经验将为中国解决与周边国家的跨境河流问题提供有效的借鉴。

毒品走私一直是人类社会的顽疾, 而当前国际最大的两大毒品产地金三角和金新月地区都位于中国周边地区, 给中国的反毒禁毒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

为应对金三角地区的毒品威胁,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中国与缅甸、老挝和泰国开展了深度合作。1993 年, 中国、老挝、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和联合国禁毒署 (UNDCP) 建立了六国七方禁毒合作《谅解备忘录》机制。1995 年 5 月 27 日, 第一次涉及毒品问题的大湄公河次区域 (GMS) 合作框架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 初步形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禁毒合作框架。这个合作框架在“东盟和中国禁毒合作机制” (ACCORD) 的框架下又得到进一步强化。2000 年以后, 通过一系列合作机制, 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制定了《东盟和中国禁毒合作行动计划》。它的出台标志着东盟和中国禁毒合作机制正式形成, 禁毒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针对金新月地区的毒品威胁, 中国与中亚国家、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国开展了广泛的禁毒合作。2001 年, 中国开始参与旨在解决阿富汗毒品问题的“6+2”机制禁毒技术性会议, 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与中亚国家一起全面推动禁毒合作。通过多渠道积极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先后与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等国家签署了禁毒国际合作协议和海关合作互助协定, 已初步形成了“6+2”机制下的中亚次区域禁毒合作机制, 为有效实施区域内的禁毒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中国与周边国家已经形成了全面的、多层次的、机制化的合作, 为中国和周边国家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同时, 非传

统安全领域的深度合作也为中国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拓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新空间。

(四) 人文发展的新起点

周边地区不仅是中国经济的主要辐射范围，同样也是中国文化传播并产生影响的重要区域。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与人文教育合作有所加强。

在政府主导的人文交流合作中，中俄双方的人文合作关系无疑是较为密切的。从2000年起，中俄两国便在总理定期会晤框架内成立了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2007年更名为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推进两国之间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2006年和2007年，中俄两国先后举办“国家年”活动，并且在“国家年”框架内开展了200多场文化交流活动。2009年和2010年，中俄两国先后举办“语言年”活动。2012年中俄又迎来了“旅游年”活动，这种人文合作不断升温，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了人文合作的成果。^①与俄罗斯情况类似，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人文合作也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在教育、科研、语言学习和文体活动方面同样取得了效果。

与俄罗斯、中亚形势不同，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地区的人文合作则更多地显示出市场主导的特点。由于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国家同属传统中华文化圈，具有一定文化共同体意识，华人群体和文化认同的存在使得中国的文化元素容易通过各种不同方式获得理解和吸收。因此，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国家的人文交流主要以自发的市场形式实现，近几年来，东亚与东南亚国家对于中国文化的吸收主要通过电影、电视剧以及相关多媒体产品进行，旅游、语言以及文艺演出、宗教活动和文学作品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交流多以市场行为的方式推动，企业行为和民间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占据较为主导地位。^②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周边态势在总体的发展趋势上呈现出非常积极向上的变化。尽管近期在周边地区出现尖锐矛盾，但是这依然只是事态的一个方面，不能够抹杀多年来中国与周边地区国家和人民共同努力所打下的合作基础。因此，深

^① 参见李亚男：《论中俄关系发展进程中的人文交流与合作》，载《东北亚论坛》，2011年第6期，第113-119页；许尔才：《略论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载《新疆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105-108页；黄立菲：《20世纪中俄民间组织的合作与中俄关系》，载《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4期，第94-106页；杜岩岩、张男星：《博洛尼亚进程与中俄教育交流合作的空间》，载《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1期，第117-134页。

^② 参见李康化：《中、日、韩文化交流与东亚文化产业》，载《东北亚论坛》，2004年第6期，第53-56页；许梅：《东南亚华人在中国软实力提升中的推动作用与制约因素》，载《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6期，第58-65页。

刻认识周边态势发展的机理与趋势，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原则，实现周边合作的不断深入是有希望的。

五 中国周边合作与发展中的新背景

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战略的调整以及中国成长发展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构变化，使本就布满热点问题的中国周边地区的形势发生了非常迅速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经济领先国家和地区由于此种变化所发生的震荡、边界争端等主权问题的重新激活、意识形态和制度之争在深层次上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矛盾与利益冲突。这些矛盾的集中凸显，大有黑云压城之势。在这样的态势下，冷静思考中国应当秉持何种精神，实施何种战略路线，构建何等样式的周边关系，这是当下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对于中国周边环境所面临的尖锐挑战，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叙述，但我们在对此进行全面的总结、审视的同时，也有必要认识到中国周边的发展空间和存在的积极态势，并且对未来的前景提升信心。

（一）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当前，中国正处于对未来发展重新确认和定位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同时，中国的发展也是周边各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机遇。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精神将成为中国处理周边问题的基本立场。

“共同发展”（Co-development）是近十余年来国际学界发展理论中形成的社会思潮和国家发展战略。1997年，法国学者萨米·奈尔（Sami Naïr）讨论移民问题时，初次使用了“共同发展”的概念，并且创造了“co-development”一词，以表明接受移民国家可以和国内的移民群体协调发展。这一概念提出之后，很快获得了存在类似问题国家的接受，加拿大等国的学者对“共同发展”的理念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并且建立了一系列以“共同发展”为理念的非政府组织。经过十多年的研究与实践，共同发展的理念得到了较为充分的阐释，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处理复杂发展问题的基本认知。“共同发展”的理念，强调了各方对于发展过程自始至终的全程参与，突出了平等与合作互利的彻底性，勾画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对于发展的正相关意义，坚持了发展的多边主义原则，提倡以制度建设来维护发展的可持续性。^①

正如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再次强调的，“在国际关系中弘

① 关于“共同发展”的相关理论论述参见 Pau Vidal, Sara Martinez, “An Approach to Codevelopment: The Transnational Migrating Community: Protagonist of Codevelopment,” ISTR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December 2008. http://c.ymcdn.com/sites/www.istr.org/resource/resmgr/working_papers_barcelona/vidal.martinez.pdf.

中国周边安全的新认知：特点、功能与趋势

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①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周边国家，周边各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经济力量的扩展使得中国对于周边国家的影响进一步增加，但中国必须尊重周边国家主权与安全，重视周边国家的感受与关切，推动相关领域的制度化建设，在合作共赢的探索中实现自己的周边权益。这是周边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二）全球化的新形态

多年以来，各国所出现的对于全球化进程中新问题的认知与解读，已经逐渐成为当前国际研究的思想基础之一，也构成了中国周边问题新的时代背景。

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化进程，尤其是以西方模式为主导的全球化模式的前景开始模糊不清。在这种情况下，反全球化的声音甚嚣尘上，甚至一些社会理论已经开始考虑重新回到内向化封闭式发展的思路。显然，这一场对于全球化问题的重新思考事关周边发展大局。

笔者认为，在未来的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全球化进程仍将继续向前推进，但全球化的形态将与 20 世纪 70、80 年代开始的全球化进程完全不同。原有的单一的、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由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以金融衍生工具深度参与市场和资源配置的、以发展和转型中国家初期开发开放为基础的全球化进程将会出现方向性的转变。

未来的新全球化进程很可能出现一个基于各个地区和各种大国组合的具体情景，其路径、模式及向度多样化的，特别是以新兴国家在若干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全球化进程有可能显现于世。新兴国家与转型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很长时间内，这种新全球化进程的许多特征可能仍然不会特别清晰，过去 30 年全球化过程中传统方式所积淀的惯性在未来依然会继续，但是，新全球化的趋势和特征将在未来逐渐显现。作为最大的新兴国家和转型国家，中国将在新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更大的空间，新全球化趋势也将为中国周边问题提供新的发展机遇。^②

这是观察目前周边问题时，必须要纵观全局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即，人们既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http://bt.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

② 冯绍雷：《俄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再认知》，载《东方早报》，2012年9月5日。

不应为当前周边问题的一时僵持局面而感到过度悲观，应放长眼量，由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所推动的全球化进程有可能为解决周边难题提供新的空间。同时，也不应由于全球化进程中的这一新常态而过于自负，忽视或放弃发展周边合作和相互理解的机会。

（三）区域化与中国周边治理

在中国的周边治理问题上，区域多边合作问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背景问题。即使是在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中国仍然没有理由不继续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多年以来，关于中国周边问题、尤其是东亚问题的解决是否可以借鉴法德关系和欧洲一体化的经验、坚持多边合作、采取多边主义的方法处理周边问题的想法一直存在争论。欧洲的经验显示，在一个利益与权益紧密相关的区域，民族国家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区域；在一个国际竞争盛行的时代，依托于区域的整体力量有可能寻找到进一步的发展动力。尽管，以欧洲为代表的区域合作经验当下遭逢深刻危机，但欧盟的挫折并不能够否认所有区域合作的成就。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将地区合作“看做是一个与人本身存在密不可分的必要前提，看做是一个需要为之做出长期努力和巨大牺牲的社会理想”，^①这种观念也值得亚洲各国在本国范围内不断强化和贯彻。

但是，多边主义的区域合作理念并不是一个僵化的教条。在任何区域合作的实践活动过程中，都有一个如何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务实态度对未来发展提出洞见，并且采取行之有效的执行手段的问题。比如，面对南海诸国领土声索，就不能天真简单地套用多边主义原则作为教条，而是要从实际出发，通过坚定的谈判和灵活的策略来解决主权与领土争端问题。与此同时，绝不放弃在经济合作领域依然积极主动地推行多边合作。后者非常可能为前者的解决提供出路与基础。虽然争端依然存在，但中、日、韩三国仍将在 2013 年初重启自由贸易区（FTA）谈判，这是对区域化进程和周边地区权益之争这一看似相互矛盾现象如何求解的一个重要注解。

（四）中国周边国际政治周期的新开端

随着 2012 年的过去，世界主要大国的选举过程也都基本告一段落。从 2013

^① 冯绍雷：《中国可以从欧洲一体化中学习什么？——从地区比较层面的一种思考》，载《欧洲研究》，2007年第6期，第9页。

中国周边安全的新认知：特点、功能与趋势

年起，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各国新的领导层有可能开始一个较为持续的执政周期，这可能为今后若干年周边局势的改善提供契机。

2012年，为了迎合选举的短期需要，周边一些国家的政治利益集团在地缘政治敏感问题及其相关领域做出了一些短视的决定，激化了周边局势，也严重损害了相关各国的切身利益。随着选举年的结束，各国的领导层变动也基本尘埃落定，各主要大国获得了宝贵的时间和机会反思现行的内外政策，也使得各国新政府能够超越选战，真正从各国和地区的长期利益出发，共同构建最符合本地区需要的周边秩序。

中国应该积极把握这一宝贵的时机，充分认识、深入理解周边问题的价值与意义，超越原有全球、区域、国别的研究层次设定，根据情况的变化创新周边问题研究体系，积极开拓，协同创新，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全面发展，构建新的符合现实情况的地区安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国际合作机制，促进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无论今后周边态势会有何种程度的起伏，只有在理论上和战略上更为透彻地理解与治理周边问题，成长中的中国都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六 结论

周边地区是大国的立国之本，也是大国成长的基石，无法想象，如果缺少了稳定的周边环境与合理的周边安全体系，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成长为成熟的世界大国。因此，周边问题也是所有新兴国家都必须正视的“成长的烦恼”。随着自身实力的快速增长，原有的地区经济结构、安全体系，乃至邻国的文化认知与社会心态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碰撞与摩擦几乎不可避免，如何才能直面问题、审慎分析、合理应对，这不仅检验着国家政治领导层的政治技巧，同样能够体现出整个社会与民众的器量与智慧。这也是当代中国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考验。

作为世界上周边环境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由于中国周边问题复杂性、功能性、整体性和全球性等特点，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周边形势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局面。尤其在东部海洋地区，各种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与日俱增，并且展现出深刻的国际背景，如果应对不当，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甚至整个现代化进程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但如果我们能够放开视野，从更宏观、更全面的视角来看，中国整体的周边局势仍然是具有积极前景的。中

国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周边国家相关产业的进步，中国与周边各国在交通运输、能源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非传统安全和人文、教育等领域的协同与合作也都形成了丰硕的成果。显然，中国周边存在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其中蕴涵着无限的发展机遇。

机遇与挑战并存，优势与风险同在，这无疑构成了当前中国周边局势的基本形态，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周边形势下，制定合理且有效的应对策略，已经成为了当前中国外交的核心任务之一。如果处理得法，周边地区将成为未来中国成长的坚实基础，但如果应对不当，周边地区也可能成为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陷阱，甚至阻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

不仅如此，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和中国的成长，太平洋西岸地区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可以说，中国的周边态势，尤其是东亚的态势，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影响世界的未来。因此，中国周边地区能否出现合作态势，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安全与稳定，也与世界格局的发展息息相关。只要坚持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积极理解新的全球化形态，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努力参与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建设，中国与周边国家就能够克服历史因素和特殊情境所造成的误解和争执，从而抓住机遇、从长远利益出发，共同建设符合新形势的地区合作机制，进而构建长期稳定的周边合作新局面。

【收稿日期：2012-12-19】

【修回日期：2012-12-30】

【责任编辑：谭秀英】